

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的“新阶层入党论”提出者之一、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

党的十六大前围绕“新阶层入党论”,理论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

党的十六大,有7名民营企业企业家当选代表;党的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党的十八大增至27人。

民企党代表比例有增加,但是增加太慢,至今没有一名民企代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仍需解放思想。

“民企党代表比例有增加, 仍需解放思想”

——访“新阶层入党论”主要提出者之一、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任鹏飞 李宁

综合各方消息,成功当选党的十八大的民营企业企业家共有27名。

新社会阶层入党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社会各界对于新社会阶层入党、入选为党代表给予了高度关切。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对“新阶层入党”由思潮转为实践的过程进行梳理和总结,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新阶层入党论”的提出者之一——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新阶层党代表比例 创2002年来历史水平

《中国企业报》:与全国两会中明星企业家云集不同的是,党的十八大民营企业代表,多数都是新面孔,而且来自基层的比例较高。

李锦:27人当中,除同时登上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中国首富”宝座的梁稳根属于“超级明星”外,其他人以“生面孔”居多。

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的十八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央企的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党的十七大时的一般不低于30%,增至一般不少于32%;相应地,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一般不超过70%”,减少到“一般不超过68%”。基层单位加的2%,应该包括民营企业新增加的10位。

成功当选党的十八大的民营企业企业家共有27名,他们多数是企业掌门人,同时也大多是党委或支部书记。15个省份无民营企业主当选,令人意外的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没有民营企业代表。

《中国企业报》:有的报刊统计是24人。

李锦:《南方周末》的统计未包括方帆时骏振兴副董事长李豫滇(贵州)、百步亭集团总裁王波(湖北)、力帆集团党委书记谭冲(重庆)等,他们是当选为党的十八大的民营企业企业家,应该包括这三位。

《中国企业报》:民营企业成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锦: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将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私营企业主也成为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六大新的社会阶层之一。当年,江苏钢铁沈文荣、森达朱相桂、远东集团蒋锡培、综艺集团鲁圣达、浙江飞跃集团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孙桂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企业家成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围绕“新阶层入党论”, 理论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

《中国企业报》:围绕中共十六大修改党章,理论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您是较早提出“新社会阶层入党”这一思想的,您的文章在中共十六大前引起了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请您谈谈当时的背景及各方的主要观点。

李锦:我是这场争论中的主要代表者之一。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提出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加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要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以外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讲话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将走向何方

的争论。一时间,许多人对于民营企业能否入党、是否破坏了党的章程,甚至对于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这种根本性的问题都产生了诸多疑问。



王利博制图

家能否入党、是否破坏了党的章程,甚至对于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这种根本性的问题都产生了诸多疑问。

看到“七一讲话”后,我感觉到党的建设历史上的两个重大突破即将到来:一个是党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问题;一个是党的组织建设与创造力问题。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再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这种现象的。

我在山东博兴县兴福镇了解到,甚至提倡“不以财产多少,而以思想好孬”为标准,改进党的基层组织,使得镇里一批百万元户中的24人担任了党支部书记。我写的调查引起最高层的关注与批示,中央派了调查组到我调查中写的36个村庄一处去核实,这个调查组最后增加到70多人。最高层再次批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做结论了。

当时,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着重论述新阶层入党的观点。

《中国企业报》:在2002年6、7、8三个月,新阶层入党的思想成了被批判的目标。一位研究员专门写了《给中央领导的信》,信中写道:需要在党的十六大前后组织全党,首先是党建研究会系统和党校系统认真研讨辩论这个特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然后务必把持有严重社党化倾向者从领导岗位上调开,把顽固坚持鼓吹社党化的人物清除出党。结果怎样?

李锦:那一阶段网上文章几乎是铺天盖地,我算是提出新阶层入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最后的结果是,最高层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阶层入党的思想写进党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所引起的这场争论,很快烟消云散。

党的十六大对党章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中有三处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是新阶层入党的说法。党的十六大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就包括民营企业主。

党的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都是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中明确阐明的思想,也是争论的焦点。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许多敏感问题做了结论后并没有再展开讨论。

《中国企业报》:按你所言,这本身是否可视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李锦:可以这么认为。这是围绕执政党历史使命的思想解放,争论的焦点是以“有产”与“无产”问题为标志的。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有几个大的焦点。直接打出姓“社”姓“资”争论旗号,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后,问题是在

党的十四大上解决的。澄清姓“公”姓“私”的争论,树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权威,这是在党的十五大上解决的。纠正“有产”和“无产”的偏见,树立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权威,是在党的十六大前解决的。

新社会阶层入党 由思想转为实践

《中国企业报》:中共十六大提出允许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入党,到如今已经有十年时间,请您介绍一下十年来新社会阶层入党取得的进展。

李锦:从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的党的十八大,是新社会阶层入党由思想转为实践的过程。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正式召开,江苏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等7名民营企业党代表在北京集体亮相。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舞台由此拉开序幕。随后,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各级党委开始有限度地选择优秀的“老板”加入执政党。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第一次提出,代表中“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民营企业党代表的数目进一步增加,达到17名之多。而在党的十七大的民营企业代表中,沈文荣、梁稳根和王健林三位无疑又是知名度较高的。朱相桂更是连任中共十五大(以乡镇企业领导身份当选)、十六大、十七大三届党代表,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三届当选党代表的民营企业企业家。

《中国企业报》:在党的十八大民营企业代表中,连任代表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无疑是一个典型。

李锦:他是先于企业成了老板再入党的,很有典型性。他在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就成为中共十七大代表。2011年秋天,梁稳根连续成为201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的“中国首富”。今年6月2日,梁稳根作为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又一次出现在了党的十八大代表名单之中。目前,三一集团作为湖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共有党员5400余人。

有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胜利和制度上的保障,党的组织发展对象在坚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新社会阶层。既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传统阶级、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又积极稳妥地尝试在新社会阶层中吸收符合党章要求的先进分子加入组织,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发展壮大。

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得益于社会对于新社会阶层认识的改观,得益于新社会阶层人士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民营企业党代表再翻一番,党也不会变色”

《中国企业报》:对于新社会阶

层入党、成为党代表的推进速度,您有什么看法?

李锦:根据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额为2270人,相比党的十七大增加了50人。其中,新社会阶层党代表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推进速度依然缓慢,至今没有一名民企代表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这说明,在党的组织建设、党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方面的重要决策尚未完全落到实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党内的一些同志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吸收新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不仅破坏党的纯洁性,甚至还会损害党的群众基础,削弱党的执政地位。这种思想的残留仍然存在。

实际上,党员成分单一,并不意味着党员队伍一定纯洁;党员成分构成复杂和多样化,也并不等于党员队伍“不纯洁”,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与吸收新社会阶层成员入党并不矛盾。因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理由,将新社会阶层中脱颖而出的大批优秀分子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的做法是错误的。

与外界事先猜测形成反差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代表的名单上,民营企业群体并没有出现猛增的情况。民营企业家中,目前约有五六十人是全国人大代表、百余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显然,成为全国党代表仍是他们所能获得荣誉和参政经历中含金量最大、门槛最高的一个。

《中国企业报》:企业老板入党近些年很受大家的关注,有声音认为,他们入党是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为了寻求安全感而入党的。

李锦:政治上争取地位是没有错的。是不是为了寻求安全感才入党,这个不能草率下结论。

《中国企业报》:现在还有人认为民营企业主入党或成为党代表是资产阶级走进党内,会改变党的颜色。

李锦:这是十多年前的论调。民营企业主入党了,也当上党代表了,党没有变色。民营企业党代表再翻一番,党也不会变色。如果说变了,倒是处在党的各级权力核心出了腐败分子阶层,出事出在党内,不会出在党外,更不会出在民营企业企业家身上,这不是我们的预测,而是事实的证明。

对于新社会阶层来说,入党并成为全国党代表,这在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及社会观念的变化,加上新社会阶层自身的努力,中国对新社会阶层的各种歧视正在得到逐步清除,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新社会阶层人士由入党到当选为全国党代表,由7名民营企业企业家当选增至27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党中央对新社会阶层的肯定和接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和继续解放思想,“新社会阶层入党”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当选党代表会越来越多。

十八大民营企业家 党代表的心声

蒋皓

党代表从我国乡村社区的企业中来,从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中来,从老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中来!

民营企业企业家成为党代表,始于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当时有7人当选;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增至27人。每届以10人增长,而且基层企业家的比例较高。

党代表27人中,多数是“生面孔”,他们大多是企业掌门人,同时也大多是党委或支部书记。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企业家”还是“村干部”,这些党代表,最基本的条件要求他们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漂亮的成绩,能够代表千万民营企业的声音。

“我拿到了党提供给我每月19元钱的助学金,至今记忆犹新。”

湖南省唯一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梁稳根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均当选为党代表,6月13日,湖南省公布63名中共十八大代表名单中,梁稳根再次当选。这位称冠福布斯、胡润双料富豪榜的“首富”代表,对党却怀有最朴素、最执著的情感。“入党就入了十八年!”梁稳根锲而不舍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2004年,在组织关怀下,终于实现了入党夙愿。梁稳根由衷感慨,“加入共产党以后,把党的事业和三一事业融为一体,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玉米地里给股东和祖国打工的长工。”

山东省中共十八大代表、登海种业董事长李登海尽管有“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中国科学家首富”的荣誉,但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民。兢兢业业为了国家搞科研38年,花的不是国家财政的钱,但把科研成果贡献给了国家,特别是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前三十年里,将科研成果都无偿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

“能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我很激动,也很忐忑。”

与前面提到的两位早已声名显赫的党代表不同,王志霞没有企业家首富、科学家首富这些耀眼的光环,她曾经只是一名下岗女工,摆过地摊、卖过盒饭,尝尽生活的艰辛。1997年考驾照时发现汇通驾校几近倒闭,遂接手过来经营。初期员工有35人,其中共产党员13人,于是她率先成立吉林省第一个下岗职工党支部。她还坚定地说:“共产党员永远不下岗。”

对于这次当选党代表,王志霞除了激动之外,还有些忐忑:“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责任更大了。在这种心情下,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还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尽心尽力去做。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带领大家如何创业和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今后,作为一个党代表的话,对自己要求也要更高了,责任也更大了。”

党代表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职责,更是权利和义务的象征。在入选的27名党的十八大民营企业代表中,与王志霞一样具有典型基层特色的代表(包括五位“村镇企业家”)占到六成以上的比例,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党代表和民营企业党代表,最能反映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悟”,是连接普通群众及千千万万民营企业诉求的“传声筒”,更是连接基层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红丝带”。

民营企业党代表人数增长,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随着民主进程加速,这一阶层的社会“参与感”将会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也会有更多的发言权。

老板跳楼 标志光伏产业接近崩溃

李宁

一周之前,浙江诚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飞,毅然选择了以跳楼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这一跳,让业界为之震惊,也使原本就风雨凄凄的中国光伏产业再添几分凛冽。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第一起老板跳楼事件了。从2011年温州多起老板跳楼事件,到今年5月南京滨森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跳楼自杀,再到6月包头市鼎大置业董事长魏刚跳楼自杀,近一两年来,老板跳楼事件频发,而跑路者更是数不胜数。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么多老板纷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企业活不下去,而老板也活不下去。当前不断来袭的自杀风波与“跑路潮”在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神经的同时,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资金链断裂、产能过剩等行业之危。

而就在8月7日,今年刚上市的“最贵新股”、知名光伏企业南大光电在挂牌之前突然宣布业绩变脸,股票上市次日跌停。南大光电的“一跳”,与李飞的“一跳”,清晰无比地映射出中国光伏产业命悬一线的真实生存处境。

当前的整个光伏行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国外来看,占据中国80%左右市场份额的欧美地区,正对我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一旦成型,所征收惩罚性关税将高达200%以上,这对于光伏企业来说无疑将是“灭顶之灾”;而从国内来看,光伏企业大打价格战,产品价格一跌再跌,整体利润率微乎其微。据美国投资机构MaximGroup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

不可否认,欧美反倾销调查与国内价格战给中国光伏行业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光伏行业走到今天这一步田地,还要从更深层次去寻找原因。

光伏危机之所以发生,在于光伏产业结构存在三大问题。其一,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2008年至2011年间,全国爆发式地出现了大批的光伏企业。到2011年,国内已经量产及在建的光伏企业产能已达到了500亿瓦特,而彼时全球光伏总装机容量仅有270亿瓦特。而市场严重过剩,又必然会导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其二,销售过分依赖于欧洲市场。中国光伏产品约有60%出口至欧盟,美国市场占20%,整个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市场。失衡的产品销售结构也由此成为本次行业性危机的一大推手。其三,产品结构不合理。来自欧盟国家频繁的反倾销调查,将成为压垮中国光伏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飞的纵身一跳,映射的是中国光伏产业的岌岌可危;而光伏行业的生存困境,又映射出整个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步履维艰。但愿光伏企业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但愿实体经济能够披荆斩棘,逆势飞扬。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明天不会再有李飞这样的经营者因为无路可走而选择放弃生命。